

台湾硕士博士历史学术文库

侯杰 主编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

(1900-1920)

本书主要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起伏为切入点，检视晚清国族主义、五四思想文化运动以及政党革命究竟为女权带来何种时代精神及内涵。妇女及女权是近代中国变动中，既醒目又模糊的一个历史区块。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即是在众多历史叙述之外，补上妇女的声音；同时，也是从“性别”的角度，描绘近代中国的另一种面貌。

柯惠铃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TAIWAN SHUOSHI BOSHI
LISHI XUESHU WENKU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
(1900—1920)

柯惠铃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柯惠铃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9

(台湾硕士博士历史学术文库/侯杰主编)

ISBN 978-7-5440-4813-2

I. ①近… II. ①柯… III. ①妇女运动-历史-中国-1900~1920
IV. ①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5317 号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

JINDAI ZHONGGUO GEMING YUNDONG ZHONG DE FUNU

责任编辑 康 健
复 审 郭志强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0351-403571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4813-2
定 价 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51-4120948

写在前面的话

侯杰

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出版界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下，这套“台湾硕士博士历史学术文库”终于要面世了。此时此刻似乎有很多话要说，除了感谢各位顾问、编委、作者，以及匿名审稿人、编务之外，我还特别想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这些年自己的心路历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两岸关系出现缓和的时代背景下，台北文津出版社推出“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好评如潮。虽然内地的读者不容易看到在台湾出版的这些学术著作，但能充分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善意，感佩出版者的远见卓识。那时的内地青年学者很想通过学术交流和著作出版，增进对台湾学者的认识、了解，尽快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进入21世纪之后，我有幸出席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见到许多学术成就颇高的台湾学者，发现他们所培养的硕士、博士也已经在学术界享有盛名。除了不断深入展开学术交流、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之外，如何将他们

培养硕士、博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成为以后十余年间我在与台湾学者的交往中思考最多的问题。正是由于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者，深入交换了关于如何精心培养学术人才的经验和心得，获得一些具体而实际的帮助，我的学生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近五年来，在各界朋友的热情邀请和细心安排下，我先后到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世新大学等台湾数十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切身感受到台湾与内地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台湾在硕士、博士培养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汲取，研究成果需要仔细消化吸收。由于台湾高校众多，硕士、博士论文数量庞大，生产周期较长，仅博士阶段就要经过七至八年的学习和研究，因此所撰写的学位论文学术价值较高者数量较多；硕士虽然修业年限较短，但研究精深、令人感到新奇可喜者也不时出现。这些硕士、博士论文不论是选题的设定，还是资料的选取、理论方法的创新，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内地正在经历教育大发展的阶段，接受高等教育者数量惊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与日俱增。只有将凝聚智慧、充满创见的台湾硕士、博士优秀学位论文在内地出版简体字本，这笔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才可以发挥更大的效能，造福身处东西南北的莘莘学子。

俗话说，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们充分认识到出版“台湾硕士博士历史学术文库”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将其视为在两岸关系出现新转机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举措。他们还礼贤下士，请我主持此事。此举也得到长期致力于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并作出巨大贡献的台湾、内地学者们

的热情支持和响应。他们慨允担任顾问，共襄盛举。造诣精深的专家不计名利，出任编委，为本文库的出版付出大量心血。各位作者及其指导教授也付出巨大辛劳，投入很大精力，或亲自校勘原稿，增加新的研究成果，或精心推荐，并撰写出精彩的评介文字，使文库增色不少。各位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和辛勤劳动也应该赢得人们的敬意和感谢。

为了推动妇女/性别研究的主流化，文库第一辑主要集中在妇女/性别议题上。妇女/性别研究在台湾已经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这在硕士、博士论文中也有所体现。为方便读者阅读和了解，我不揣浅陋，对本辑所收录的著述略作评点、推介。

如何更好地发掘正史所提供的资料，以开展妇女/性别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衣若兰以《明史·列女传》为论说对象，通过审视清初编修明史的过程，探讨女性是如何被纳入正史书写的，完成论文《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作者在考订《明史》版本差异的基础上，指出种种差异对于《明史·列女传》个案选择的影响；通过考察历朝女性历史发展的过程，阐释为何女性能够入史、以何种方式入史等问题。无论是揭示《明史·列女传》的资料来源，如文人笔记、闺范教书、地方志、官方私人修史等，还是论述史学与朝代政治格局演变，尤其是旌表制度的关系，作者的论证都做到了环环相扣，逻辑缜密。就性别研究而言，作者眼光独到地将女性入史和男性入史进行对比分析；就阶层而言，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明史》编修的过程中，列女身份从上层到下层的转移。对于清朝史官十分小心地碰触在清朝入关和建立统治过程中大量女性自杀或者抗暴身死的现象，作者的分析可谓匠心独运，创见迭出，引人入胜。

性别与政治，是妇女/性别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台湾政治大学

历史研究所柯惠铃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30)》，通过剖析近代中国革命中的妇女，揭示妇女参与革命的内在理路，论证国族主义如何与妇女运动相联系等问题。作者回溯了清末保守与激进思想对女权的主张，提出第一代革命者们的回应方式影响到后来妇女运动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引入更多变因，挑战家庭的束缚，推动妇女运动。第二代革命者承继五四反抗传统，反抗封建，同时卷入革命的潮流，遭到政治力量的强力介入。而北伐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目标，导致妇女运动处于两难境地，并与新兴的国家权力产生联系。作者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创新尝试，一定会得到学人热烈的回应。

文本、再现、新文化史……这些学者和读者略感陌生的词汇、概念与相关方法，却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李晓培的运用下，成为探讨唐代入道女性心灵世界的有效工具。这集中体现在她的论文《唐代入道女性世界中的性别意识与情欲》里。在作者的笔下，生活在千年之前的女道士们不仅从道教之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创造了别样的精彩人生。通过对墓志铭、正史、典籍、小说等不同类型的文本及其书写者的分析，作者既凝练地处理了唐代入道女性的性别意识与情欲问题，又阐明了真实世界与文本世界中女性之差异和共同点，使学术研究呈现出新的样貌。

借助法律文献、女教书、正史、地方志等教化意味浓厚、伦理色彩鲜明的资料，是否可以阐释清楚明代“女性复仇”这一极具性别意蕴的话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晓昫的论文《明代女性复仇故事的文化史考察》，从性别、法律以及文人思想等不同角度切入，揭示了传统中国人对于“复仇”的认识和理解，又赋予

呆板的贞洁记述以无限张力，洞悉隐藏于背后的思考与诠释，再现士人群体趋同又充满变异的复杂图景。作者不仅意识到以女性为预设读者的女教书的特殊价值，丰富了明代妇女史乃至文化史的认识，而且还探讨了女性复仇故事的添加、改写甚至是挪用所表现出的时代特色，解答了有关弱女子与暴力复仇之间的性别角色冲突等问题。

依靠档案研究历史，几乎是所有研究者的强烈愿望。如何用好档案，对通过档案展开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却又是一种挑战。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的李清瑞知难而进，以巴县档案的拐案记录为中心，辅以中央档案中的拐案记载、地方县衙的审判制度和地方档案中的非拐案记录等资料，完成论文《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1752—1795）》，集中剖析清代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女的案件，及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作者认为在四川移民社会中，年龄层的分布和性别比例不均衡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等因素，导致社会不安定，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拐案的泛滥。而被拐妇女的婚姻状况以及外出工作、行动上的诸多差异，也与被拐形成某种联系。在分析拐案的时候，讼师与胥吏，如差役、书吏、代书等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

京剧女演员是近代中国社会中引人注目的群体，在1900年至1937年间活跃于沪、平、津等地。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张远的《近代平津沪的城市京剧女演员（1900—1937）》一文，将她们的生活情态、形象塑造及其与观众的互动，特别是在捧角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等置于近代中国妇女史、性别史的脉络中加以论说，提出很多新见解。作者从女演员的学艺生活切入，论及女演员的定位、舞台形象建构，旨在阐明女性逐渐从私领域走向公共空间的历程，在争取职业权、经济自主的同时，也成为观众、媒体及社

会大众任意窥探、讨论，甚至批评、中伤的目标。女演员常常受到权贵、媒体、捧角者的操控，最终放弃职业生涯而投入婚姻、步入家庭，多数人没有成为走出家庭、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而她们在舞台内外所演绎的戏剧人生，令人深思。

报刊是近代中国社会旋转乾坤的重要媒介，因此，发掘近代报刊资料、开展媒体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成为一股热潮。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柯小菁以1900年至1937年间出版发行的8份女性杂志为研究素材，撰写了《塑造新母亲：近代中国育儿知识的建构及实践（1900—1937）》，系统考察新的育儿知识如何得以传播，进而改变母亲教养儿童的方式，塑造出新母亲的形象。作者不仅考察了男性知识分子为了强国保种而译介西方育儿科学知识，建构起新的育儿世界，而且通过对读者来函、时人传记、口述史料的分析，揭示了母亲们的个人育儿经验，从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揭示母亲和父亲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显现出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价值。作者对不同女性期刊的细致解读，有助于把握身处不同时代的女性在育儿知识的运用、母亲角色的认同等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多元并存的特征。

借助文献史料中大量缺席的歌谣、谚语、俗语等民间文学作品以及口述访谈资料重现历史和记忆，不仅是研究方法的改变，更是学术思想和研究视角的调整。社会史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从下向上看历史，阐释处于失语状态的普通人的生活与观念，而妇女/性别研究的价值更在于使处于失语状态的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得以呈现。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的陈千惠以1920年至1970年台湾中部集集妇女的生活史为重点，撰写论文《台湾中部集集妇女的生活史（1920—1970）》，从“婚姻与家庭”、“医疗与生育文化”以及“消费文化与沙龙”等方面展现了普通妇女

的日常生活。作者不仅超越传统史学的某些做法，也跳出妇女/性别研究偏重探究性别意识、妇女解放运动、婚姻制度、妇女社会地位、妇女家庭角色等议题的局限，进入较少为人们关注的区域或普通妇女生活史范畴，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作者还采用口述访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生动地记录了女性的亲身体验和心理感受，另一方面也挖掘了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由此凸显同性或异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权力分配。作者所进行的这些田野调查，有助于创立比较完整的生活与观念、历史与记忆的性别解释。

这批台湾硕士、博士论文的妙道尚不止于此，有待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品鉴。

如此大规模地出版台湾青年学者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在内地尚属首次，希望能够借此对提高内地硕士、博士论文质量，提升相关领域研究水平有所裨益。然而，遗憾和不足，似难避免。

本文库采取匿名审稿制度，每部论文都经过两名匿名审稿人的专业审定，同时充分尊重台湾学者意愿。如有学者提出保留自己姓名的繁体字书写，尽管是例外，还是予以尊重。至于各位作者的学术观点和表达方式，亦尽可能遵照原稿。只是在用词和注释等方面，则在尊重台湾学者用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内地读者的阅读习惯，做了一些技术处理，目的是使台湾的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在内地拥有更多的读者，使台湾的青年学者在内地获得更多的知音。

最后，衷心祝愿海峡两岸的学者和学生们齐心协力，创造出具有更高价值的文化精品，培养出更多的学术新人，使本文库其他各辑在未来的岁月中顺利出版，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 录

绪论	1
上编 从闺秀到女杰：晚清革命中的性别再造	14
第一节 母强与国强的想象	14
第二节 清末革命政治中的“女杰”	37
第三节 从闺秀到女志士	59
下编 冲决父权：改造社会中的新女性图景	81
第一节 都市性别新景观——“女学生”的构成	81
第二节 改造女子，改造社会	104
第三节 打出象牙塔——爱国运动与女子觉醒	130
第四节 何处是归程？	154
结论	176

绪论

(一)

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倾向于将国族主义的兴起视为 20 世纪初的“现代景观”（modern phenomenon）^①，即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将传统中国的文化认同主义（culturalism）^② 转变成为国族认同主义（national-

① 引自杜赞奇的评论。Prasenjit Duara, “De -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Nation”,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6), p. 32.

② 按照哈理逊的解释，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self - image）可以通称为文化主义（culturalism），它的基础是一个共同历史遗产和承接的共有信仰，不像国族主义的基础是现代概念的国族国家（nation - state）。James Harriso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Hunter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Research Institute on Modern Asia, 1969), p. 2.

ism)^①，例如研究梁启超的思想演变，列文孙（Joseph R. Levenson）描述了梁氏如何替自己辟出一条由文化主义到国族主义之路^②。19世纪中叶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在求强求变的深重危机感驱使下，许多知识分子已逐渐相信中国需要一种现代意义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③，藉此以抵抗外国势力，而这种现代国族主义其精神包括拒斥传统许多成份和文化意义上的国族属性（nationhood）^④，由于一种潜藏的传统专制及现代民主的二分法意识，使得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如何转变传统、再造文化成为争论中心。随着1905年满清废除科举，各种新式学校的设立，松动了传统天朝统治的社会结构，而立宪与改革活动的开

① 关于西方学者讨论及引用“文化主义至国族主义”（culturalism - to - nationalism）的学说，汤恩森有详细的介绍。文化主义主要指帝制中国自秦汉（221 B. C.）以降，发展出来以文化为主的认同方式，除了文化承续外，没有其它中国主权政体（Chinese State）或国族（Nation）的概念。而国族主义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触西方文明、和西方势力入侵后的产物，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反对帝国主义和救亡、再造国家的倾向。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pp. 2-6. 本文对于“文化主义至国族主义”学说的引用，仍依既有的普遍解释，即将文化主义区辨为重要的儒家中国形象，也就是以文化界定的共同体（culturally - defined community），不同于种族界定（ethnically - defined, racism）或是政治界定（politically - defined, modern nationalism）的共同体形象。

②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 i - ch' 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 108 - 122.

③ James Townsend 对于“文化主义到国族主义”的批评指出，这个理论的主要缺点是视转变为“通体”与“绝对”，也就是一方面过度强调帝制时代文化主义的控制力及前现代国族主义的弱化，同时复过度强调现代之文化主义的褪逝及国族主义的胜出。与前述相反，文化主义可以与其它概念，诸如国家、国族等并存，甚至到了现代，文化提供国家及种族国族主义者各种奥援。文化主义和国家国族主义可能在各自领域中主宰精英们的信念，但他们二者却从未独霸有关中国国族的思想 and 情感。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p. 24. 笔者基本上参考了这个对于文化主义与国族主义的修正观点。

④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vol. 1, pp. 98 - 104.

展，使得社会出现一批新的精英阶层^①，接二连三的对外挫败，使得政治随同文化都在遽烈救存中流动。革命主义者以反满为政治诉求，将种族中心（ethnocentric）说提升至革命思想的中心位置，其方式不在抛却传统文化，却是将文化移作国家操作（operating）的对象，成为政治的工具之一，国家的建造反转传统中国以文化为主的认同，将国族置于文化认同之上，这过程或可解释为文化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culture）^②，而这种革命的政治文化与国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革命所强调的共和、民主概念，推翻了传统天子的权威来自于天命的说法，伴随着新知识传播对官僚体系的冲击，在宣传人民参与政治的合法性时，开启了新的政治文化出现的契机。Henrietta Harrison 认为在探究中国民族性意义的演变时，不应只是注意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对民众的灌输，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形成过程——在其中，所有创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通通涉入并共同形塑新政治文化的属性^③，这个说法无疑为研究晚清政治运动与民众间交互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Lynn Hunt 研究法国大革命，也提出政治对于形塑一般百姓生活的重要^④。在承认政治文化是为一种机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就呈现了一个记忆与忘却的特殊叙事方式，也就是关于革命进程的历史叙述夹杂着事实与诠释两个面向，革命所独有的历史语境更是不得不审慎细辨的问题。

在国族主义孕育下的政治文化，具有重新定义社会角色的作用，对于性别论述的形成有其重要意义。革命以许诺、号召、命令等特有言说方式，表现对家国的强烈激情与热爱，其所宣扬的民主被知识妇女所吸收，而经由转换满清异族的政治专制/传统社会妇女所受的压迫的相应性上，性别议题在激烈变革的呼唤中被提至与政治革命彼此互相纠葛、

① R. Keith Schoppa, "Local Self - Government in Zhejiang, 1909 - 1927", *Modern China*, vol. 2, no. 4, (October 1976), pp. 506 - 509.

② Prasenjit Duara, "De -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Nation",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pp. 32 - 34.

③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 - 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

④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213 - 236.

映照^①。透过这种性别重现引发性别再造，无疑对于女权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个革命与性别的互相斡旋，乃至彼此相互界定的过程，始自清末国族想象中所发展出来的对于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认识，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学说的影响所形成的世界观（worldview）带着强烈的不可逆转的直线进步史观取向^②。环顾列强所处的世界中，知识分子趋向将中国当时所追求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变革，援附与西方相通的各种普同化（universalizing）的现代概念，以“妇女”为例，“妇”在强国保种的改革者心中，不是指个别能力差异、对于生存有独立策略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单元^③。对这个整体单元的一般概述，强调是国家富

① 当时宣传革命最具激烈色彩的《女子世界》，引自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第936页。有亚卢（柳亚子）所写的《哀女界》通篇充满反满革命的激越语调。“吾敢披发裂喉，以告我二万万同胞女子。曰：嗟嗟！公等之束缚驰骤二千年于兹矣，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如饮狂泉，如入黑狱。……今日何日？此公等沉九渊，飞九天，千钧一发之界线也。公等而不甘以三重奴隶终乎？则请自奋发、请自鼓励、请自提倡、请自团结，实力既充，自足以推倒魔障”。妇女在种族革命中的定位是三重奴隶，政治宣传促其对自身处境不该继续缄默。

② 本杰明·史华兹着，叶美凤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84-104。

③ 刘人鹏指出近代中国在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进程时，具有主体发言位置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落入帝国/国族二元论述的框架中，并置身于非西方的一端，参与建构了帝国长生不老的想象中。而妇女在这个论述框架中，被召唤成为现代化议程中的一环，男性知识分子将妇女作为落后、弱恶、贫穷、残废等国族想象的具体呈现，藉此男性主体抒发弱势处境的焦虑，表达被征服者欲居于征服者的欲望。参见氏着，《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学生书局，2000）。笔者基本上同意刘人鹏的研究，惟近代中国有关妇女解放的言说本身即是妇女解放史的一个重要组成，但绝非全部。虽然作者也注意到必须考处到妇女在不对称的男/女结构中，也还是具有主体能动性。而这个主体在权力结构中所发挥的交涉能力及共同涉入建立男/女对称（或不对称）的权力体制，显然是在过去研究妇女解放中较被忽略的。笔者即试图在以女性为书写主体的文本中，利用主客易位的方式，来重新寻找中国妇女运动的内在脉络，即不论妇女运动的断裂或连续，都不能忽略女子亦是具有性别策略的个体。

强至上的意识而非以争取妇女个别权益为目的，但其所倡导的女学却表现了集体想象与个人实践的交互影响，先觉妇女乘此时代风潮进入社会活动中，遂使这个整体与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交织着变动前进^①。

妇女运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后，注入了新的元素。如同一般对于五四女权运动的理解，当时蓬勃发展的各种刊物多将婚恋问题、社交公开、教育平等、职业开放等与妇女相关问题纳入讨论^②，在显示知识分子受到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洗礼后对于个人独立、自主的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政治上的裂解，知识精英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关注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对于平民教育的重视与唤醒民众的呼吁颇盛于一时^③，进一步促成社会运动的发展，妇女运动在此历史条件中亦注入新的动能。改良社会者提出支持妇女进入公领域的各种论述^④，但由于男女所凭借的社会生存条件根本不同，五四男性知识分子的改良言论中，其主要内容常常更强烈表达的是对传统封建礼教观念的攻击^⑤，而在谈论妇女性别处境时，其观察的角度更接近于男性自身对于传统、对于社会的改革观点，甚至合法、合理地在打造另一种新的社会性别序

① 革命妇女的思想行为与其同时代妇女相较，多数具有开路先锋的前导作用。清末留日参与政治活动的女留学生尤其显著。她们在日本接触到有关中国国族主义争论的议题，与男性知识分子共同处于救国氛围中，以参与和论辩如何延续国家命脉为使命自任。Joan Judge, "Talent, Virtue, and the Nation: Chinese Nationalisms and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6, No. 2, (June 2001), p. 785.

② Chow Tse - tsung,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915 - 192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8. 曾举出五四时期有四百多种期刊出刊。

③ 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35-36。

④ 公/私领域的观点参照西方学者的分析，即公共领域指政治领域，私领域则与妇女位处的家庭领域有关。见 Nira Yuval - Davis,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p. 78 - 79.

⑤ 毛泽东对长沙赵五贞的自杀，系借着讨论女权议题呈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女子的弱者牺牲形象，映衬着传统思想文化的的不义性、不文明性，对于礼教的指责是十分具体且有力。Roxane Witke, "Mao Tse - 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 In 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pp. 7 - 31.

阶，妇女在公共空间的现身及其社会待遇仍是颇受限制^①。

（二）

19世纪末在面对一连串西方思潮的冲击与挑战之下，正如时人所称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中国引发了各种变化。虽则以中国地域之广袤，各地区的变化程度及思想、心态或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思想演变交相呼应，特别是关于女权问题的提出与论辩。

西方的挑战迫使中国反省自身的弱点与危机。当时中国各种改革派分子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亟欲引进西方学说、思想、制度，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的防堵其在中国的传布威胁传统文化^②，因为妇女主要的生命历程皆环绕着家庭，位居传承父系文化重要地位，以致对于妇女问

^① 王政的研究指出，五四前夕许多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女学生，仍面临着礼法的限制，不得与家庭成员之外的男性混杂相处。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5. 关于清末以来妇女解放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即下层妇女率先接受西方传教士的启蒙教育，城市妓女的独立自主，在开创女性教育、流行、品味的新风气，正好倒转了传统上行下效的社会风习，借用罗志田的研究所提出的看法，这种改变亦可说是“权势转移”。罗志田，自序，《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页1-17。

^② 1920年代，据言当时访问中国的罗素，仍说中国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国家。罗素所谓的国家或许是根据现代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实体”（polity）的概念而来，若依此标准，中国当然称不上是“国家”，但帝制中国早已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有一个承天命的天子建立天朝，与儒家文化结合，四方臣民则以归顺于中国文化与否来决定其是否为共同体一部分。参见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pp. 3-6.